

清代朱石梅紫砂锡壶赏



图1 朱坚刻梅题诗锡壶



图2 清石棣款锡壶

■湖南长沙 张晓笛

流行于清中期的紫砂锡壶,以其精良的制作、独特的人文气息、稀少的存世量,受到了收藏家的追捧,其中不乏收藏大家。从清代开始,就有王室、达官量身定制。其中清嘉庆、道光年间著名的紫砂名家朱石梅,其所制紫砂锡壶由于锡求上佳、工求精绝,故多被珍藏于博物馆,也有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收藏家手中。

朱石梅(生卒年份待考),字石梅、石眉、石棣,原名朱坚,浙江绍兴人。他善画墨梅、人物、花卉,篆、隶、行、楷书亦劲逸风致,尤精铁笔、竹、石、铜摩不工。其创制了紫砂胎锡包壶,并著《壶史》一书。因传世的紫砂锡壶,钮、把和壶的嘴用三颗玉镶制,所以这种茶壶既称锡包壶,又称“三颗玉”。《画林新咏》作者陈文

述赞朱石梅壶云“仿佛宣和博古图,昆刀珍重切云腴。盛名甘让朱公叔,茶谱何劳比曼壶。”

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把朱石梅的紫砂锡壶。其一为朱坚刻梅题诗锡壶(图1),通高8、通长17、口长6.4、宽3.8厘米。壶方体,敛口,鼓腹,平底,三角形足,长方形盖,玉顶,木柄。腹壁一面刻梅花图,旁书“暗香浮动。朱坚写。”相对的另一面刻“雨前雨后春已妍,此中自有氤氲天,我欲贮以中冷泉。石棣。”木柄嵌银丝,篆书“石棣制”。壶内底刻篆书“永宝”二字。其二为石棣款锡壶(图2),高9.4、口径5厘米,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吴仲超先生捐献。

南京市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朱石梅的紫砂胎包锡壶(图3)。其通高8.4、口沿边长4.5、底边长5.9厘米,呈斛形。

青玉螭虎状柄,盖正方,上嵌矩形白玉钮,壶身一面刻牡丹图,另一面隶书铭“微润欲沾、雨前吐尖”。款字为“己丑小春月 石梅”。锡黑灰色,内紫砂胎,内底钤阳文篆书印“杨彭年制”。此壶制于清道光九年(1829),1972年出土于南京市栖霞张化村,出土时见有一座清咸丰元年墓志。

而坐落于西湖之畔的唐云艺术馆,收藏有一把朱石梅制锡壶(图4),似乎在与苏东坡对吟“提锡壶,游西湖”。此壶口径4.8、底径9.1、高8厘米。壶身一面刻有书法“蟹眼沸,鱼眼浮,用汲古,泉仰流。石棣制。”另一面绘有一枝梅花,并题有“一瓯春雪”四字,落款为“桢雀”。在壶柄上,又有“铁壶庐制”四字。这把锡壶,朱石梅显然在设计上体现了清代文人特有的一种审美风格。壶上的

铭文“蟹眼”“鱼眼”,出自于唐朝陆羽的《茶经》,描述了水沸腾的样子。苏东坡有《试院煎茶》诗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飏飏欲作松风鸣”。故用《茶经》的典故刻在茶壶上再合适不过。另一侧的梅花和“一瓯春雪”四字,又暗含当时文人用雪水饮茶的风俗。《红楼梦》中就描述说,妙玉收集梅花上的雪,共一瓯,埋在地里,舍不得吃,在宝玉来庵里做客的时候才拿出来泡茶待客。而锡壶的底部,是仿汉代瓦当的样式,这也符合乾道文人好金石的特点。

无锡博物院藏有一把朱石梅紫砂胎包锡壶(图5),壶面刻有“品泉竹里,一瓯一吟,如忘年友。中顶之茶,用惟一两,以此自随,权之不爽。石梅作。”苏州市博物馆也藏有一把“石梅款紫砂胆刻锡壶”。香港茶具文物馆罗桂祥先生生前则珍藏有一把“包锡砂胎方斗壶”,上刻“太白一斗,郑谷半瓯,阑干夜挂,秋风小楼。”另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“朱坚梅花诗句锡壶”,可为朱石梅全锡壶(无砂胎)的代表作。其圆形短颈鼓胸,扁平短嘴,嘴镶小铜片。墨绿色玉盖钮,青白玉柄。盖有一篆文“石某”小长方印。壶身刻梅花图,另一面刻诗“冰作肌肤玉作神,一枝消受十分春。瑶台若问三生事,如此风姿有几人。”款署“石棣”及长方印“朱坚”。底刻楷书两行为“嘉庆庚辰竹林居士藏”。此壶为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)“竹林居士”特请朱坚特制。



图3 朱石梅紫砂胎包锡壶



图4 朱石梅制锡壶



图5 朱石梅紫砂胎包锡壶

渤海“品位”陶牌小札

■吉林长春 马洪

渤海(698—926),是唐朝时期勿吉后裔——粟末靺鞨为主体在东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,初称“震国”,首领大祚荣自号震国王。713年,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,统辖忽汗州,加授忽汗州都督,从此,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国号,成为唐朝版图内的一个羁州,臣属于唐王朝。926年,渤海国被辽所灭,传国十五世,历时229年。

2006年受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邀,笔者参与《渤海上京城1998—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》的绘图工作,从而得有机会进入库房,接触到大量渤海时期的珍贵文物,其中便见到这件“品位”陶牌(图1),并亲手精心绘制了素描图(图2)。该陶牌为青砖所制,残长18、宽16、厚5.4厘米,出土于渤海上京城第2号宫殿基址中,正面素面,背面饰压绳纹,“品位”楷书二字,以刊碑之法,阴刻于带有绳纹的背面,线条刚健,富于力度。仔细观察,在“品”字上部至少还有一个文字,砖体上残存“L”形人工刻痕,根据字形分析和逻辑推理,揣测是“四”字左下角的笔画。古代举行典礼时,常以标牌注明参加者就位处,这种标识牌



图1 渤海“品位”陶牌拓片



图2 本文作者手绘“品位”陶牌素描图

有“牌位”“版位”之称。牌位没有形制定式,制作材料以陶、木居多,牌文或刻或写。在古代的九品官阶制度中,四品者,应属较高的职位。

以靺鞨为主体建立的渤海国,有本民族自己的语言,学术界普遍认为属于通古斯语系,而无自创的文字,渤海国通用汉字。《新唐书·渤海传》记载渤海立国第一代王大祚荣“颇知书契”,北宋部书《册府元龟》载:“渤海诸王皆右文,初建国,即有文字书契。”这里所言的“书契”,

所指即是汉字,可见渤海君王和贵族都通晓汉字,具有汉文化的素养。渤海作为唐王朝的藩属国,与中原交往频繁,联系密切,其都城建制、典章制度、纪年立法、生活器具、文学艺术等,都深受唐文化的影响,晚唐大诗人温庭筠在《送渤海王子归本国》一诗中写道:“疆理虽重海,车书本一家。”指出渤海文化与中原唐文化的趋同性。史料显示,渤海上层与唐朝中央政府、日本天皇间的往来,国书、表、牒、状及诗赋作品,都是用汉字

书写来表达的。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材料看,渤海碑志、官印以及大量的模印瓦,均使用汉字,其中官印“天门军之印”,印体形制和印文,基本属于唐印风范,印文既不是铸造,也不是凿刻,而是和唐印一样,采用蟠条焊接工艺。贞孝公主墓碑和贞惠公主墓碑,从行文结构、遣词造句,到引用典故、碑文书写,皆流畅熟练,风格宛如汉碑,可见渤海对汉文化吸收程度之深。

这件“品位”陶牌,二字呈现唐楷俊朗端雅的风范,其中似还汲取了魏碑笔意,显示出渤海书者汉字书法的涵养和造诣。渤海有欣赏汉字书法的风尚,文献记载唐昭宗时,渤海人高元固入唐参加宾贡式,取道福建拜会归隐莆田延寿溪的诗人徐夔,元固曾对徐夔说:“渤海得公诗赋,皆以金书,列为屏障。”因而徐夔有诗相赠元固。

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哲夫先生,将一帧“品位”拓片装裱成精致的卷轴,赠予珍藏。“品位”二字,其词义可有两解:一曰官阶,一曰品质。本人乃一介书生,对官位并无兴趣,倒是颇为看重个人的修身养性,遂将“品位”字轴挂于案头墙上,时时自警:为人行事,不能卑俗。